

# 时代精神图谱的当代亮色和历史底蕴

□钱念孙

“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这是广大文学艺术创作者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要职责和使命。

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最直接最迫切的任务,当然是聚焦亿万中华儿女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从当代中国所发生的历史巨变中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新灵感,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彭学明的长篇报告文学《人间是艳阳天》,讲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下脱贫攻坚的感人事迹;滕贞甫的长篇小说《战国红》、忽培元的长篇小说《乡村第一书记》,描绘优秀共产党员扎根农村贫困地区,带领群众攻坚克难,守护绿水青山,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动故事。还有全景式表现“蛟龙号”深潜器进行海试的长篇报告文学《蛟龙逐梦》,反映国产大飞机研制和试飞过程的长篇报告文学《C919,飞向蓝天》,歌吟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的报告文学《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刻画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的电视剧《黄大年》、电影《黄大年》以及长篇报告文学《心有大我至诚报国——黄大年》等等,都是在深刻表现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变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作品。

我们时代的精神图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主流精神价值彰显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精彩写照。它产生于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中,又伏源于近百年中国革命和建设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里,更扎根在中华民族厚重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肥沃土壤的深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时代的精神图谱,夺人眼球的不仅是鲜明的当代造型和流行色泽,还有那洋溢着坚韧勇毅格调的深沉历史底蕴和醇厚文化韵味。

当今一路高歌猛进气象万千的中国,是古老悠久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来产生广泛而积极影响的“精神图谱”,从上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精神”、“铁人精神”,60年代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70年代的“红旗渠精神”、“小岗精神”,80年代的“改革精神”、“女排精神”,90年代的“孔繁森精神”、“抗洪精神”等,到新世纪以来众多“时代楷模”、“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所张扬的精神,我们会发现,尽管这些精神光耀于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闪烁在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人身上,但在精神实质上却是一脉相承,彼此重合的。赤胆忠诚的爱国情怀、坚毅顽强的奋斗意志、精益求精的钻研品格、敢闯敢试的革新追求、爱岗敬业的挚诚奉献、助人为乐的古道热肠等等,无不自然至终充盈弥漫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精神图谱的每个画面,在时代风轮的快速旋转中呈现并绽放出缤纷的色彩和耀眼的光芒。

古往今来,君子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推崇的正直人格形象;时代新人作为党的十九大大报告对培养什么样人提出的新要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塑造人才的新目标——表面看,君子人格与时代新人似乎相隔遥远、差距较大,实质上,两者基本精神和内在要求是高度契合、颇为一致的。

综合时下权威解释,“时代新人”主要涉及五条标准,即有理想、明大德、强本领、勇担当、重实干。其实,这五个要求,古代先哲论君子人格特点时早有涉猎,并且不是浅尝辄止,泛泛而谈,而是响鼓重槌,反复申论。“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君子学以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君子之志于道也”(《孟子·尽心上》),这不是强调君子要有理想有抱负吗?“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卦》)、“君子怀德”(《论语·里仁》)、“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周易·益·象辞》,这不是把明大德作为成就君子的必备条件吗?“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人之不已也”(《论语·卫灵公》),这不是将本领和能力看作君子的基本素质吗?“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这不是肯定君子要有担当精神和忧患意识吗?“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这不是推崇君子要有奋发有为的实干精神吗?

当然,古代君子与今天的新人所处时空不同,各自面对不同的生存条件和发展问题,需要以不同思路、不同方法回应和解答不同的时代课题,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两者在相对和处理不同时代的矛盾乃至云泥之别时代难题时,具有大致相同的内在精神气质,即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撑,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 一

如此突出君子人格与时代新人的内在联系,自然涉及对文学艺术和人文思想领域里继承与创新关系的认识及解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出自《诗经·大雅·文王》中的名句,多被解释为“周虽旧的邦国,其使命在革新”。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早就指出:此句意义与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与《尚书·康诰》“作新民”相联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镌刻于商朝开国君主成汤的浴盆之上,意为每天沐浴洗澡去除污垢,才能保持洁净清新;引申意为每日以德净心和润身,才能保持思想、言行、人生的纯洁、健康和兴旺。“作新民”是指使人每日反省,悔过自新。因此,“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并非说周朝脱胎换骨,革故鼎新,变成一个新的邦国;而是指“周朝虽为旧邦,命运却呈现新的气象”。宋代理学家程颐曾说:“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这里所说的“新”,并不是对原有学问的抛弃和否定,而是指在旧有学术基础上的不断进步,有所拓展和深化。

纵观中国学术史,人文社会科学里谈论治国理政和思想道德的许多概念,虽然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表述,并且每个时代常常强调和宣扬自己与既往不同及相异的一面,但实质上,不同词汇和说法不仅意蕴一脉相承,而且内涵大同小异,并行不悖。譬如,我们今天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就有着

我们时代的精神图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主流精神价值彰显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精彩写照。它产生于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中,又伏源于近百年中国革命和建设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里,更扎根在中华民族厚重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肥沃土壤的深处。

源远流长的深厚传统。它与古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等民本思想,不仅意脉相互贯通,精神也高度吻合。其他如崇尚清廉为政、勤勉奉公,倡导严于修身、俭约自守等等,莫不如此。为什么唐太宗怀念魏徵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为什么在社会生活疾速演进、今非昔比乃至发生沧海桑田之变的当下,我们仍强调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其原因就在于:现代由古代延伸而来,现代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而漫长的古代不仅在时间上是千百个既住现代的累积,并且在知识文化上拥有无数经验和智慧的积淀。

人类社会的发展,除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领域会发生彻底否定和颠覆既往理论及产品的状况外,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许多反映社会人生基本生存规律的理念及思想,往往并不会随着时代变迁或朝代更迭而失去意义,反而会伴随时间推移和历史检验溢出更加夺目的光彩。我们之所以能够从古代经典如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等中获得怡情明智、温润心灵的审美感受,其原因正在于此。人们之所以经常说鉴往知来、借古喻今,也在于历史和传统中饱蕴着大量处理今天繁难事务的睿智和启示。

## 二

基于以上理解,描绘时代的精神图谱似应注意三个问题。其一,不论是“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还是“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都不应只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摄取时代表象,照葫芦画瓢式地描摹时代的五光十色和繁华喧嚣,而应真正走进生活这大本书的字里行间,在把握其宏大叙事的整体结构及情节走向的同时,透彻审视每个精彩片段和闪光字句的来龙去脉,既体察生活表层的显凸意义,又触摸生活深层的潜在意脉,写出时代华彩乐章的激昂旋律和动人曲调,及其内里所拥有和饱满的强大历史文化支撑力量。这就是说,我们刻画新时代的壮丽景观和时代新人的典型形象,应有深厚的历史意识、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在浓墨重彩表现民族新史诗和塑造人物新形象时,要让作品跻身文学史或艺术史佳作的行列而并无愧色。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和追求,但作为本应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的文艺工作者,自当取法乎上,心向往之。

其二,描绘时代的精神图谱,主要是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和中国人民的出彩生活表现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和否定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广阔性和多样性。那些精彩呈现我们民族灿烂历史和英雄人物的作品,那些出色展示中华儿女走出国门为人类和平和国家发展拼搏奋斗的作品等,同样可以突显我们时代精神图谱的光彩和色调。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在追寻康乾盛世由来和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以曲折情节和生动细节表现主人公励精图治、反腐倡廉等故事,传达的正是我们时代所需要和肯定的价值追求。至于新时期以来大量描写中国人闯荡海外,包括表现“一带一路”历史和现实的作品,由于呈露当代中国人在异域生存发展状况的同时,刻画了中华儿女讲仁爱、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的民族性格,自然也是我们时代精神图谱里不可或缺的生花之笔。

其三,时代精神图谱展现的是一种超越于个人精神状态之上的集体意识和价值认同,是我们时代普遍推崇的向上向善的精神追求和气象品质。由此决定,当代社会生活中某些精神现象,如消极厌世、悲观颓废等精神状态,不应在我们精神图谱里不同程度“霸屏”,成为推介和玩赏的对象。这不是说我们不能触及和描写客观存在的负面阴暗生活,而是强调文艺家要坚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即便披露和表现生活中负面因素,如尔虞我诈、沉沦堕落等等,也要高吟真诚善良、勤勉进取的可贵,写出世道人心的向背和人间正义的力量。这是生活本身呈现的客观事实,也是社会演进的客观逻辑和客观规律。翻开二十四史,虽然间或总能看到阴谋不轨和冤屈血泪,但中华民族能够跋涉千难万险而生机勃勃地走到今天,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乃在于: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对垒中,真善美必能战胜假恶丑。这是我们伟大民族能够不断凤凰涅槃历久弥新的大道至理,当然也是文艺家体验生活琢磨生活表现生活,描绘我们时代的精神图谱不应违忤的天地良心。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与中国新时代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建设研究”项目开题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来自全国20余家高校、科研机构的30余名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

如何理解和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主持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范玉刚在研讨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形态,课题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为魂,立足中国文艺现实,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并重新审视当下的文艺本体论和文艺功能论等问题。一种文艺理论学术体系的建构,应当为中国的文艺问题、中国的审美经验提供有效的解释路径。与此同时,它也应该能够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背景下,为世界文艺的发展贡献中国色彩,以社会主义文艺新气象发挥引领时代潮流、引导社会风尚的作用。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处处长林振义指出,文艺从古至今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艺发展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学习与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系列重要讲话在当今是十分必要的,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意义不言而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文艺在这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主任李文堂表示,中国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开始就高度重视文艺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都体现了启蒙主义精神与文以载道的传统。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强调了文艺在新时代语境中的教化功能,尤其强调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这对于重建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塑造中国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丁国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处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大学教授孙书文指出,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包含着深厚的文化资源。如何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问题,是建构新时代文艺理论学术体系的重大理论问题。

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文艺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取向

“人民性”是本次研讨会的焦点话题。“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逻辑起点与根本价值取向。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指出,当下文艺理论中最受忽略的一个问题,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最为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为了谁”的问题,即文艺理论研究的立场问题。近三四十年以来,中国的文艺研究与文艺实践之间,一度产生了有意无意的疏离,从而告别了新文化运动时期、50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景象。现代主义标新立异的结果是文艺学远离了大众。文艺研究的“人民性”向度的回归,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新时代发展的重要内涵。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张红军认为,在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历史中,“人民性”曾经是一个被高度政治化的概念。诸多关于“人民性”的讨论,都是片面的、缺乏历史连续性的,都没有能够深入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视域,来解释“人民性”的文艺观与政治观。就此而言,“人民性”这个概念中的历史感、时代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和深入的挖掘。我们需要对其加以重新审视。

那么,如何理解新时代文艺创作的“人民性”向度呢?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徐粤春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论述是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灵魂。在新时代的文艺实践中,“人民性”的创作导向,需要落实到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创作实践中;需要把握审美风向,在认识艺术的本质和功能上实现与人民群众的审美理想和审美初心;需要关注文艺现象,提升对新文艺现象的理论概括和理论思维能力;需要聚焦代表性作品,引导现实创作和社会审美,从而将“人民性”的理论话语落地、落实、落小、落细,使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建立在坚实的大众文艺实践的土壤上。

新时代文艺应当具备怎样的功能导向?

重构新时代文艺的功能论是专家们讨论的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丁国旗表示,文化文艺工作与社会科学研究是“培根铸魂的工作”。无论是文化文艺创作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将“用明德引领风尚”摆在关键位置。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刘飞认为,应当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把握当代中国的文艺事业。我们需要在和平开放的社会生活中,建构起一套既能够相互承认、尊重,又能够超越、整合的文化、教化机制,从而实现文化的一体多元。

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梅敬忠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文化人”的教化传统。我们需要加强对文艺“教化”功能的再认识,为教化正名。“教化”一词,最切合文艺教育功能的定位,是传统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精华,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应当纳入当代中国的思想体系中。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主任李文堂也明确提出,要坚持文以载道的传统,并将其渗透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重新关怀中。山东大学教授谭好哲指出,由于文艺反映以人为中心的整体社会生活,人与社会的所有社会性关系都能够在文艺活动中得以体现。所以文艺在满足人的审美需求基础上,还应当具备更为多样的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交往功能等,从静态角度来看,文艺的多种功能并非机械式的叠加,而是以审美功能为基本,以感性化的方式有机融合在一起的。从动态角度来看,以感性方式融为一体的文艺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其主导性、多样性、融合性、主导性是文艺功能的三个基本特性,只有抓住这三个特性,才能对文艺功能形成具有辩证性与历史感的认识和把握。

# 建构新时代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

□林雅华 谷雨

文化、文学现象以及所有理论和观念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要在理解这三种基本特性的基础上,建构起与时代需求相适应、与时代实践互动的文艺功能论。

当然,文艺的功能论与本体论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其中的张力使得两者之间形成了既独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晓霞认为,目前的艺术理论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强调艺术的审美功能及自律性,另一种则强调中国的艺术理论要回归到社会教化的传统。建立在单一维度基础上的文艺理论框架,不足以解释当下中国的文艺现实。只有将艺术教化传统的研究与艺术规律的研究结合起来,即艺术的本体论和功能论统一起来,才能探索出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艺术实践的理论架构。

新时代文艺应该如何重构批评标准?

文艺批评是引导文艺创作、提高审美范式、引领道德风尚的重要力量,也是本次研讨会的热点话题。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康健指出,伟大时代的文艺需要健康有力的批评,针对批评家与作家的亲密互动关系,批评家不仅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更要有激浊扬清的勇气担当。既然文艺批评与文艺评价体系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那么,如何在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之间,找到适合现代文艺理论评价体系的平衡点呢?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周由强认为,当前的文艺评价标准和方式较为多元,但现实更需要对文艺实践有直接指导作用的主导性文艺评价标准和方法。中国自古有艺术评价品级的传统,从南朝《书品》的“九品中正制”,到初唐张怀瓘的“三品”分法,再到康有为的“六品十一级”划分方法,对我们当下的文艺评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当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秀作品、文艺精品、经典作品、伟大作品、不朽作品等关于文艺作品品级问题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在增强基础理论研究、遵循文艺发展规律的同时,结合当前文艺实践,建立起一个比较科学完善的文艺评价品级理论框架。

立足新时代的发展特点,结合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现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对当下的文艺批评提出了新的标准——那就是“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佳作”。《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主编董阳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当下的人民生活与文艺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切实反映时代需求、人民需求,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不断筑就“文艺高峰”,应当成为我们切实努力的目标。通过可信的理论认知破解难题之问,正是当今文学理论学习的根本。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祁述裕认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文化领域需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文化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当前我国的文化市场还有很大的开放空间,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正确认识文化开放和文化安全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只有坚持文化市场开放,才能有效维护文化安全;只有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才能不断提高中国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在此过程中,也要注意放宽文化市场准入和完善监管相结合,做到有序开放。

如何挖掘新时代文艺的理论资源?

建构中国话语,还需厘清西方与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明晰当代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如何挖掘新时代文艺理论资源建构的文化理论资源这一问题,许多专家发表了看法。深圳大学教授高建平认为,从本体论角度来看,从五四的平民文学到人民文学的提出,再到80年代西方话语体系的引进,文艺理论的话语构成紧随社会发展而产生变化,我们应该用当下时代的视角去总结 and 归纳这些文化资源。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潜认为,厘清文化资源需要对不同阶段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解读。梳理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脉络,有利于贯通当前文艺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源流。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徐粤春认为,中国文艺理论资源具有多种构成和来源,其中包含作为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根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作为重要影响的西方文艺理论。不同的理论体系,各自有各自的范畴、概念、术语,各自有各自的研究重心、学科特色和学术品格,如何把他们打通贯穿,实现中国文艺理论的创新飞跃是研究的关键。

中国当代文艺话语体系的建构,体现着中西两种理论资源的兼收并蓄,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与西方文化传统的交流与对话,对于新时代文艺理论学术体系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林雅华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觉醒的政党,对文艺的力量有着十分清醒与深刻的自觉,并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意识和启蒙意识。与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没有被全面与长时段殖民的国家,所以我们的政治制度和道路选择不是被切割和嫁接出来,而是在不间断的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中涵养出来的。在文化的中华民族性和中国特色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的今天,我们应当拥有文化自信。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主任李文堂指出,厘清文化资源一方面要明晰其背后的文化发展规律与现有学术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树立全局思维,不迷失于单独的学科体系与理论话语。只有跨学科、跨领域的整体意识和全局观念才能使理论得以融合、创新才有可能。厘清本国文化传统,吸纳国外优秀文化资源,推进中西马三种文化传统的融合统一,是构建新时代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

本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重要论述与中国新时代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建设研究”学术研讨会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落幕。会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论述的核心理念与要义,就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本体论、功能论以及文明交流互鉴基础上的中华美学精神等议题展开的一系列研讨,体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理论力量与问题意识。会上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美学精神”、“重构中国话语体系”等问题和观点,触及本质,值得持续和深入探讨。